

□雨茂

今年1月初，监考大学一年级现代汉语课程，最后一题要求学生结合本地情况，谈谈如何保护方言。我看了10份试卷，发现同学们即便搜肠刮肚，能提供的策略仍然很有限。对我这个深受普通话折磨的人来说，题目非常容易，仅瞬间冒出的想法就不下五种，但对这些把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的00后新生，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

31年前，我考入一所位于黄淮平原的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在这所距家乡1500公里之遥的地方，我报到时就遭遇了语言关。一位分配宿舍的工作人员问我：“你‘甲长’来没有？”我一脸蒙，盯着他茫然失措，虽然对方连问三次，我还是一头雾水。对方于是问“你父母来了没有”，这回我终于听懂了，窘迫得一身冷汗。我当即醒悟，他可能问的是“你家长来没有”。对于“甲长”这个怪异发音，我在掌握黄淮次方言的语音特征后才彻底弄明白了，但那已是一个学期之后的事。

开学后，很快就上了中国现代文学课，两个班级合班，老师是天津女知青，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，感觉跟播音员没什么两样。她口才极佳，课堂上很活跃，师生互动频繁，这对于习惯了填鸭式教学的我们来说，感觉特别新奇。我很担忧老师点我的名字，因为我基本不会说普通话，勉为其难的“川普”又让人听不懂。但怕什么就来什么，第一节课老师就点了我的名。活该我“倒霉”，因为按照音序，我的名字排在首位，当然还有老师后来提到的原因——我的姓、名都



是第四声，特别响亮好记。老师的问题是什么，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当我回答完毕，80名同学集体沉默，彻底蒙圈，连笑场的人都没有。老师却会心一笑，一边示意我坐下来，一边问“你是四川人吧”，我尴尬地点点头。

接下来，老师用纯正的普通话引用了一段话，大意是四川人在家是一条虫，出川就是一条龙，还用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、巴金等人来佐证。当时，我正处在一种挫败感中，气候、饮食、语言、习俗都不适应，甚至有些后悔出川读大学的决定，但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想到了邓小平、朱德、陈毅等人，瞬间涌起一股自豪感，觉得我出川读书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老师当然不是为了恭维出川的我辈，她是要借此激励我勤奋读书，争取一个好的前程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国家并没有强制推广普通话，大学中文系老师也是南腔北调，多数人不会讲标准的普通话，只是“浙普”“湘普”“沪普”等，本省老师干脆就讲方言，让有的学生如听天书。有同学不认真听课，老师就说“你这样不管斤”（不能这样）；有同学漫不经心地踩着铃声进教室，老师就说“快胡滴”（快点）。日常方言听多了，也能猜出大意来，但听课就不行了，专业术语太多，许多时候只能借助板书辅助理解，或者根据手势、表情去猜，学习很费劲。生活上也有很多不便，后勤服务人员大多

讲本地方言，同学们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，除东北、河北等地的同学外，大多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，彼此交流并不顺畅。

好在我们的学习能力都比较强，善于归纳总结、求同存异，把难懂的方言口语词汇剔除掉，换用比较好懂的书面词汇，交流基本没有障碍，同时提高了方言辨识能力，这是此前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方言区的同学多，也方便语言、文学课程的学习，比如不能辨别入声字时，就让福建的同学读，一读就记住了；一些古诗词用普通话朗读不押韵，用广东话读马上合辙。

入校一个月后，中文系搞普通话测试，东北、河北等地的同学安之若素，方言区的同学却寝食不安，议论纷纷，我更是如坐针毡。测试由现代汉语老师一人全程操作，我当然通不过。强化辅导一个月后，好歹通过了，但我知道，其实我的方言还很重。毕业三年后，作为教师，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，得益于此前三年语文教学经历，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长足进步，方言轻了，加上一段时期的强化训练，我拿到了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。

二十多年来，教书育人、从事社会活动、到外地进行学术交流，都使用普通话，在家中与夫人、孩子交流，讲的都是普通话，与父母沟通时，当然得说方言，所以我可以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无缝转换。

儿子生下来就接触普通话，连说梦话都是标准的普通话，感受不到我当年因为口音重受到的折磨。我建议他学习本地方言，他不愿意；让他跟

▶1984年初冬，冯德英与《泉城文艺》同仁登泰山。左为冯德英，右为本文作者郭廓。



【名家背影】

文坛逝英才，「三花」依然红——悼念著名作家冯德英先生



冯德英先生

□郭廓

寒风刺骨、漫天飞雪时节，惊悉著名作家、我的恩师冯德英先生于1月17日早晨在青岛去世，享年86岁，让人心疼。

冯德英先生1935年出生于胶东牟平一个山村，仅读过5年小学，可谓自学成才。他1949年参军，19岁开始写《苦菜花》，于1955年完成初稿。他把书稿寄到解放军总政文化部，还给陈沂部长写了一封信，希望得到指导。陈沂部长看了初稿，觉得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就把稿子转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。小说几经修改，1958年得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。《苦菜花》描写了胶东半岛昆嵛地区王官庄的抗日斗争故事，抗日烽火给了冯德英创作灵感。小说出版后广受好评，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，累计出版一千多万册，并被改编成电影，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冯德英先生将8000元稿酬全部捐给了军烈属，他最感恩的是哺育他的家乡父老。

冯德英1958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，任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。1959年10月，《迎春花》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好评如潮。作品描写了解放

战争时期胶东人民的斗争生活。之后他又创作了《山菊花》。

1980年春，冯德英从部队转业，来到济南工作。他到济南市文联就任主席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创办一份独具特色的文学刊物。于是《泉城文艺》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应运而生。1984年初冬，他率领《泉城文艺》编辑部同仁登上泰山之巅，以鼓舞士气。我有幸与他同行，一路聆听恩师对文学的真知灼见，受益匪浅。我是冯先生力排众议从工厂调到市文联并委以重任的《泉城文艺》诗歌和评论组的组长，并兼任党小组组长。在编辑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，1983年，当他得知中国作家协会组织诗人赴内蒙古矿区采访团成员有我之时，给予大力支持，使我有了一次深入矿区的经历，创作出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诗歌作品。

著名书画家赖少其书赠的一块“每日煮书”匾额，挂在冯先生的书房里。的确，冯德英先生在工作之余，一直笔耕不辍。1986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染血的土地》，这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长篇系列小说《大地与鲜花》第一部。《冯德英中短篇小说选》1997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其中收有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和抒发自己艺术见解的创作谈。

冯德英是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家，是“山东省100位为新中国成立、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之一，被中共山东省委、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“山东省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”。但他做人低调、平易近人、生活俭朴，注意培养文学新人。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，曾让许多新闻记者失望。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，他却竭诚相助，分外关心和重视。《泉城文艺》在冯德英的指导下，开辟了“青年诗人”专栏，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作者不惜版面。

冯德英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是在战火中出生、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，我是胶东人民的儿子，我与故乡的土地和人民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。我要永远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去反映他们的生活，歌颂他们的美好心灵。无论在我前面的路途中有多少困难在等待，我都终将不悔。”

如今，冯德英先生驾鹤西去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。恩师的音容笑貌永留人间，正是“文坛逝英才，‘三花’（指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山菊花》）依然红”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